

#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赵勇宾

(榆林学院 社科系,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文化意识的差异。

**关键词:**天主教;权力;文化差异;宗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871(2004)02—0105—04**

在中国古代史上,基督教曾有过三次大规模试图渗入中国的尝试,第一次是聂斯托里派传入,即唐初所谓的景教;第二次是方济格派传入,即元代所谓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朝后期天主教派传入。聂斯托里派基督教传入时受到严重迫害,逐渐从中国消失。而方济格派除了主要在蒙古统治阶级中建立了一些小规模基督教社团以外,对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冲击。但明末传入的天主教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给中国带来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包括意识形态因素在内的深层次接触,因此它比前两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值得探讨、研究。

天主教在中国从明末小规模传播发展到清康熙年间24万教徒<sup>[1](P366)</sup>,乃至成为居佛教、伊斯兰教之后在中国流行的第三大宗教。真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其在1723年却被全面禁止,当时各省天主教堂被拆除很多,传教士除供职钦天监的20余人外,其余均被驱往澳门。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被严格禁止信仰天主教。在以后的一百多年内,天主教在中国内地逐渐走向衰亡,直到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时期,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掩护于1844年再次来华。

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原因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是间接的,内在因素是直接的,且作用力最大。本文就其主要内在因素试做探析。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在中国大地根植的外在因素有二:

首先,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历代传播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一直是一个比较连续的过程,而基督教却几盛几亡。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延续下来,是因为其与基督教传教有两点明显不同:第一,外来的伊斯兰教信徒惯于聚居,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教内以及与当地居民通婚,进行家族繁衍,不但不断地增加人口,而且逐步地由“侨民”向“本土化”穆斯林转变,遂在血缘上根植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同化混一的道路。第二,伊斯兰教一般不向外来人传教,其内部宗教仪式和活动也比较简约,利于避免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正面冲突,且尊崇儒学,这样便于在文化上根植于中国。而基督教却走的是一条征服异土文化和宗教的道路,所以与正统儒学不合,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佛、道二教冲突激烈,这样使得它很难从文化上根植中国,也影响了其发展。<sup>[2](P40)</sup>其次,正当清中期中国严行禁教的同时,罗马教廷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解散令规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除了供职清廷的教士不得擅离职守外,其他传教士均可自由回国。<sup>[1](P373)</sup>这一解散令无疑使在华天主教雪上加霜。这也是其未能根植中国一重要外在因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内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

自明万历中叶以后,明朝步入它的衰亡期。这期间土地集中,剥削苛重,政治腐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国各地不断有民间秘密结社,农民起义。在山东、河南一带,白莲教迅猛发展。因为白

收稿日期:2004—03—10

作者简介:赵勇宾(1977—),男,陕西榆林人,榆林学院教师。

莲教教义宣传让人们追求“真空家乡”(即极乐世界),在“无生老母”(即创世主)处得到永生,号召人们反抗现实,所以封建统治者认为白莲教某些教义类同于天主教教义,借绞杀白莲教的同时也绞灭天主教。如南京礼部侍郎沈惟就带头发难,指控天主教与白莲教相互勾结,称西教士误导民众,参与谋反,刺探军情,妄图颠覆朝廷。于是出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南京教案”等一系列反天主教运动。万历皇帝给传教士定了“立教惑众、蓄谋亵渎”的罪名,颁布了禁教谕旨。此次反教会运动规模虽小,但它代表了中国封建皇权与天主教第一次直接冲突;当时在代表“天意”的强大封建皇权面前,谁敢于向皇权挑战,就预示谁将灭亡。这对刚在中国站住脚的西方天主教来说,其福音事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至少在明末之前,其不能再迅速广泛传播。在天主教和中国皇权的第一次交锋中,天主教溃败铩羽。

清朝代明,在华的天主教一度发展迅速,但由于在华天主教因“礼仪问题”争论与皇权再次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了清中叶的禁教。所谓“礼仪问题”即是否允许教徒敬孔、祭祖以及是否可以以“天”“上帝”称呼“天主”问题。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就以这种认可方式吸引大量中国人入教,而接替利玛窦工作的龙华民(Nicolas Longbardi)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则不同意,于是出现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从1645年罗马教皇颁布否定中国礼仪令至1704年的教皇格勒孟十一世,以中国敬孔祭祖等为“异端”派特使多罗(Carlo T. M. doTornon)来华商议实行办法。其间天主教和中国朝廷之间的“礼仪”之争几起几落。1700年康熙帝就向传教士宣示过他对礼仪问题的看法:敬孔祭祖纯为表示爱先师,爱先人,是一种俗礼,与宗教无涉,并无宗教性质。<sup>[3](P318)</sup>他还亲自向他们解释说:“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其灵魂在其牌上之礼。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sup>[4]</sup>而多罗面见康熙时声称:“欲禁绝中国敬孔子与敬先人之礼,以为异端,不准教民教士沾染”,<sup>[5](P247)</sup>这使康熙大为不悦,并再一次向多罗阐明如果有人反对礼仪,传教士就很难再留在中国。于此同时,康熙慎重地派传教士艾若瑟(Joph - Antonius Provan)等去罗马,了解教廷真意,然后再作决策。但多罗不等使者回来,于1707年在南京公布教皇禁令。康熙大怒,宣布:“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sup>[4]</sup>多罗出使给在华传教活动带来危机,为了挽救传教危

局,1720年,罗马教廷再派特使嘉乐(Cardus Mezzabarba)来华企图缓和局势。嘉乐来华后,虽在某些礼仪方面作了让步,但仍是为禁令而来的,康熙再解释也无济于事。1721年,当嘉乐回国离开澳门时发表了罗马教廷公函,宣布除了不许以“天”、“上帝”称天主,不许祭祖、敬孔外,还不许教堂悬挂写有“敬天”字样的匾,如已悬挂,必须取下。然而禁条这一款,却是直接指向康熙帝。康熙曾亲书“敬天”二字之匾悬挂于京师天主堂。同时嘉乐又宣布康熙帝本人不能改动教皇禁约上的一字一文,也不能暂时停止禁约在中国的效力。这是对康熙皇帝权威的挑战。康熙大怒,下旨:“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sup>[4]</sup>由此,天主教在华踏上了不合法的道路。一些西方史学家和神学家在评论此事时说:教廷做出影响深远的错误决定,它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存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sup>[6](P218)</sup>雍正帝继位,禁教政策更趋向严厉,除京师教堂教士未加取缔外,命各地西教士陆续迁移,安置澳门,逐步遣送回国。雍正七年各省督抚遵雍正谕旨札飭各府州县密查,将天主堂改为育婴堂、义学、庙产等。雍正严厉禁教的原因不只是承先帝遗旨,其实还有禁止包括白莲教各支派的一切“邪教”,其目的在于消除其统治和安全之隐患。我们从雍正帝召见巴多明,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和费隐(Xavier Fridelli)三位在京司铎的训言中可见其用心良苦:“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此为尔教之要求,朕亦知之。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现在虽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sup>[7](P256)</sup>雍正正是担心教徒受传教士支配,在外国入侵时,会成为内应外敌的力量,所以才严厉禁教,以巩固封建王权的统治地位。

雍正以后,乾隆、嘉庆几代,天主教一直在全国被严行禁止,虽有极少数传教士仍在活动,但总体上看,直到19世纪初,在华天主教已大为衰落。至于1840年后,天主教“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掩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sup>[6](P199)</sup>其已与前期大不相同,本文在此不做讨论。

由上可见,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未能扎根于中国,有很大的政治原因。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安全和罗马教廷教权对中国封建皇权的挑战,是导致清中期封建统治者严行禁教的主要原因。

## (二)天主教与正统的儒家文化及佛、道思想的

冲突。

从1552年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第一次把福音带向中国的那一天起,天主教就与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开始了面对面的冲突。面对古老强大的儒、道文化,沙勿略失败了。随后,经过几十年一次次的失败,1583年传教士终于在中国内地取得落脚的允许后,利玛窦感慨万千地说,要想争取中国人接受福音,“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sup>[8](P143)</sup>一样难。的确,即使中国封建君主同意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但深受几千年正统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也很难接受,于是两种思想意识形态自始至终在激烈地碰撞冲突,强大的正统思想不断冲击、同化天主教,直到天主教被击败。

1582年,当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就感受到中国古老文化思想的强大。为了促使传教事业的成功,他巧妙地首先“同化”为中国人,融入正统儒家文化中。在他的领导下,天主教传教工作迅速发展。面对强大的儒家文化、佛、道思想的排斥,他提出“由上至下,学术指导,合儒辟佛”<sup>[9](P127)</sup>的传教政策,使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但到利氏死后第六个年头,即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中西思想磨擦最终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南京教案。教案的发动者,南京礼部侍郎沈惟宪称天主教“远夷阑入教门暗伤王化”。所谓“王化”,实质上就是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儒家思想。于是正统保守的儒家士子,佛家、道家信徒群起攻之。天主教又一次陷入中国传统思想的围剿战中,因为“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其他民族的宗教是独有的,错误的,只有得之于上帝启示的真正的基督的宗教,才是普遍的,正确的。因而与其它宗教不能并存。”<sup>[10](P84)</sup>因此天主教在中国打着“尊儒”的幌子,以儒排斥佛、道,最终达到“超儒”、“代儒”的目的。我们从利玛窦逝世前一年写给教会官员的信中可见其真意:“我热望其他人也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派(指儒、佛、道)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多的多”<sup>[10](P50)</sup>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天主教想取代中国儒道文化而独尊的企图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严酷的历史已为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天主教与儒、佛、道之间思想冲突从小规模开始发展到后来愈演愈烈,而作为传统保守的儒、佛、道对天主教主要从“礼仪问题”、“暗伤王化”等方面进行攻击。明朝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收集了当时儒、佛阵营反天主教的一些主要代表作。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儒、佛、道联合,捍卫正统儒家思想,并向世

人告警:传教士们表面上尊崇儒家,将其天主教之道伪装成与尧、舜、周、孔之学说无大差异,但实际上是“阴肆其教,排儒、斥老、抑佛,驾其于尧舜周孔之上”,要使“阳排释、道以疑儒,阴贬儒宗而探学”。徐氏文集还指出,西方科技为“淫巧之技”;如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日心地动之说斥之曰:“夫第假象以明算理,亦何所不可。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背道,不可为训,古未有若是其甚者也。自是而后,必更有于此数端而外,呈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伊于胡底也。”<sup>[11](P281)</sup>徐氏文集还指责天主教有伤“三纲五常”,斥之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虽是总属人伦,而主教、主恩、主别、主序、主信,其间各有取义,非可以夷天等地,推亲作疏,阳反从阴,手顾奉足,背会以西党,却野而于宗也。”<sup>[11](P281)</sup>正因为天主教教理有损正统伦理纲常、孔孟之道,准其肆行,必将使中国人不忠不孝。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和认可的异端邪说,自然也就不可能驻足于神州大地。

天主教与正统儒家及佛、道思想之间的冲突,一直发展到清中期禁教为止。由于正统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绝对地位,天主教不但不能动摇它,反而在以儒家为领导的儒、佛、道阵营进攻下,连连溃败,最终被封建统治者定了个“立教惑众,蓄谋叵测”的罪名,严行禁传于中国。这也是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另一主要原因。

### (三)从东西方文化意识差异看天主教未能根植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未能立足于中国,从宏观角度看,其实也受东西方文化意识冲突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排斥和中西方宗教精神的差异,也使天主教没有扎根的土壤。所谓传统文化心理即长期以来中国人把自己国家当作世界文化中心,把外来文化看作是“蛮”、“夷”文化,落后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心理的排斥,所以它无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一切包括宗教看作“蛮”、“夷”之物,予以拒绝。在中西宗教精神方面,西方人“轻看现生、重视来生”,讲“平等”,视一切人都是天主子女,彼此平等。而中国人的宗教精神却相反,重视“天命”,认为人的生命吉凶,操在上帝和神灵的手中,相信只要现世“尽善”,来生必定将“脱俗”的业报轮回观,故重视现生。讲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从一出生命运中就注定“贵”、“贱”之分。在对“上帝”的理解也与天主教截然不同,“上帝”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位主宰自然和人间祸

福的人格神,人们信奉祈求它能带来平安吉祥,这和天主教中所讲的“上帝”本质上就存在区别。所以,传教士对来听道的人讲敬奉“上帝”,人们能相信,但要人们相信耶稣赎罪、拯救灵魂,就很难相信。即使一些中国人信奉了天主教,但对信奉目的,教义理解与天主教本义根本上是不同的,许多人信奉天主教是为了求得传教士的帮助,如医病、避荒、救济等。所以说,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世界,重视人,这种文化心理意识使人们信奉任何宗教却免不了带上各种世俗功能,使其给予信徒某种可感知的利益,且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信奉,这是和天主教“上帝”的本义相悖而行的。所以,中国人从根本思想上就不能接

受天主教,这也是天主教难以得到广泛信仰和传播的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某一种因素促成的。它其实是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下促成的,并且,内因是直接而有力的促动力。在内因的各种冲突表现上,其最终又归属于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斗争需要的范畴之内,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统治对其的拒绝作用,比意识形态的排斥作用更大,其原因是中国封建君主无论是对外来宗教,还是土生宗教,都具有绝对选择、支配性,使其绝对臣服于王权。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宗教发展史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张维华.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董丛林. 龙与上帝[M]. 北京:三联书店,1996.  
 [3]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4]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彩印本)[M]. 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  
 [5]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0.  
 [6](美)秦家懿.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 孔汉思、吴华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0.  
 [7]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M]. 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  
 [8](意)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M]. 北京:1997.  
 [10]J. 谢和耐.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M]. 于硕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11]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畴人传(卷四十六,卷四)[A]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The Caus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Failure to Be Implanted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Zhao Yong - bi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Yulin College, Shaanxi,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The causes of Catholic church's failure to be implanted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re rather complicated. The external factors mainly includ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navoidable weaknesses that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by the Vatican which weake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The internal motive factors a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wer of the Vatican and that of the emperor in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the orthodox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awarenes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Catholic church; power; cultural difference; religion thought

(责任编辑:杨鹏亮)



#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作者: [赵勇宾](#)  
 作者单位: [榆林学院, 社科系, 陕西, 榆林, 719000](#)  
 刊名: [榆林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YULIN COLLEGE](#)  
 年, 卷(期): 2004, 14(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1条)

1. 张维华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1993
2. 董丛林 [龙与上帝](#) 1996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 1998
4. 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彩印本\)](#) 1974
5. 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90
6. 秦家懿, 孔汉思, 吴华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1990
7.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38
8. 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 何高济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1983
9. 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1997
10. J. 谢和耐, 于硕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1989
11. 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畴人传\(卷四十六, 卷四\)中国文化概论](#) 1984

##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程玲娟 [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 2006

晚清山东教案或民教冲突主要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山东地方社会发生一系列碰撞而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碰撞, 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实质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教会教士在入住并试图立足于山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 与地方社会所发生的碰撞主要缘于教会教士作为一种新的不同的势力强行涉入地方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本文即是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审视晚清山东所发生的重要教案或民教冲突。一般来说, 资源争夺可分为物质资源的争夺和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本文选取梨园屯教案、兖州教案等作为非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 在这些教案中, 民教双方的冲突主要围绕非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本文选取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诸如曹单场山教案、巨野教案、沂州教案、嘉祥教案等作为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案例来探讨, 在这些教案中, 民教双方的激烈冲撞主要是由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引发并展开的。

梨园屯教案发端于传教士和教民要在该村玉皇庙建立教堂, 此案中民教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发展与农村民众玉皇信仰息息相关。所以该案可以被看作是“上帝”与“玉皇”之间的一场斗争。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 玉皇庙已经成为村社中公共的文化信仰空间, 而教堂作为陌生的异质空间, 在外国公使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被迫授权下, 强行切入村社抢占村社公共的信仰空间; 与此同时, 教会势力与村社精英展开政治资源的争夺, 当村社精英不得不成为村社事务的旁观者和容忍者时, 教会便成功夺得原本属于村社精英主导的管理空间和权力空间。为了维护传统村社的空间资源及空间秩序, 村社精英特别是村社布衣精英与民间组织结盟, 领导民众将这一对抗进行到底。如此, 教会与村落、村落群的空间争夺战在持续升级中通向义和拳运动的爆发。

兖州教案缘于天主教宣道会主教安洛泰进入儒教圣地——兖州城设堂传教, 因此该案可以被视为“上帝”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冲突。作为圣人故里兖州早已历史地成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空间、儒教信仰空间, 而兖州官绅则是这一方文化空间、信仰空间的天然尊长和当仁不让的主宰者, 他们掌控着这一空间内的诸多资源如文化资源、信仰资源及舆论资源等, 而这些资源又现实地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源。教堂作为陌生空间, 依恃强权屡次试图打入异教空间的圣域, 兖州官绅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各种资源, 于教案初期发起强有声势的“揭帖”战, 并以“身体”和“性”为主题与教会方面展开信徒资源的争夺。最后在德帝国强权的支持下, 教堂空间终于成功切入兖州城。教会空间的成功切入从“符号战争”的角度来说, 天主教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反教斗争以及官绅所掀起的反教舆论员已经使得反教的观念、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空间的争夺势头和深入人心的反教动员相结合, 在随后的义和团风暴中深刻显现出来。

从如上的教案来看, 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民教矛盾与冲突长期胶着的主导因素, 但是把晚清山东教案之主要原因都归结为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显然是片面的, 它更广泛的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争夺。或者说物质资源的争夺在某些地区的教案诸如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中表现的更为激烈、残酷, 如曹单教案、巨野教案、嘉祥教案与沂州教案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交织着权力的争夺。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教会依恃强权广泛干涉地方诉讼以及争夺村社主导权等; 而物质资源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财物、收获物、房产及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在生态危机中, 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欲立足于地方社会并得到扩展, 就必须参与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在这场资源争夺运动中教会因有国际背景而占有优势, 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才能够以强劲的气势冲击、挤压着的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以及民间组织空间。势必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地方官绅及民间组织的或明或暗、或缓或急、或单独或联合的抵抗与斗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的步步进逼之下, 国家的生存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 大量的民教冲突在长期的、严重的资源争夺中不断趋向激化、升级并最终通向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2. 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 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 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须进行修改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 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 进行公开打击, 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 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 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 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 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 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文共包括七部分, 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垮。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一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 3. 期刊论文 [韩福秋, HAN Fu-qiu 近代早期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9(4)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 4. 学位论文 [彭香丽 现代“神曲”——格雷厄姆·格林的“宗教三部曲”](#) 2003

该文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出发,依据文本分析,围绕格林的“宗教三部曲”的主题,探讨小说家的宗教观。论文包括前言、四个章节和结论。前言介绍了天主教和其它思想流派对格林的影响及其在三部曲中的体现。第一章综述了格林的宗教思想。第二章通过《布莱顿硬糖》,剖析了格林的地狱观。格林描述了主人公公平的一步堕落,探讨了邪恶世界中的冷漠人性,说明罪恶使人走向地狱的深渊。第三章结合《权力与荣耀》阐述格林的天堂观。第四章围绕《问题的核心》,介绍格林对“炼狱”的理解。结论部分总结了格林作为杰出的英国现代小说家的艺术成就。虽为一名天主教徒,格林的创作只是将自己的宗教观与艺术思想如实现给读者,并未宣扬天主教义。他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批判社会的邪恶,赞扬人性的美好。

### 5. 期刊论文 [徐力源, Xu Liyuan, Zeng Qiang 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国际资料信息](#)2005, ""(11)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经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徒失去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 6. 学位论文 [梁艳芬 天主教学校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学生的自我和谐等特征影响](#) 2008

在现今社会,常听闻青少年是叛逆的一代。而青少年期正是人生黄金时段,是人生发展与成长的关键时刻,心理发展也开始出现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处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期,在独立感和成人感日益增强的他们,在主观上要求独立与客观上难于摆脱依赖的矛盾中,若得不到适当的指导、尊重及关心,不慎走上歧途,将来便会对社会做成沉重负担,而青少年接受何种教育方式是以决定他们日后将成为怎样的社会人。在孩子成长中有很多外在因素不断地影响着他们,如学校的教学方式及日渐泛滥的互联网信息及复习的社会环境,但父母是有绝对权力去干预这些因素,被认为对孩子有益的教学环境因素选出而加以施行。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和亲密的家庭气氛有利于人格的健康成长;否则,可能会引发青少年各种心理问题。

本研究是希望探讨现今对物质生活重视的功利社会裹,知识技能的培育是先于德育的培养,因此精神生活方面的管教方式往往被忽略。通过对有宗教信仰的学习环境与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的学习环境作出比较,探讨对13岁至15岁的青少年的自我和谐程度与家人亲密程度有那些差异。

研究中采用了自我和谐量表(SCCS)及家庭亲密程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II-CV),对307名13至15岁的初一至初三的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1)天主教学校的青少年自我和谐程度、家庭亲密程度显著高于非天主教学校青少年,(2)父母关系亲密和非非常亲密的青少年与家人的亲密程度比父母关系普通的要高,其它结果可从以下的分析看出来。

### 7. 学位论文 [马亮 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 2005

本文论述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自亨利八世(1509-1547)起至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数十年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英国的宗教改革以民族独立为旗号,在政治上伸张世俗权力,在教义、教会仪式上改革教会组织机构,最终形成英国国教。作为欧洲宗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宗教改革摆脱了对罗马教会的依赖,专制王权得到了加强,不但打击了教皇至上的中世纪教条和教皇权威,而且打破了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长期以来一统欧洲的政治局面,展示出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本文以宗教改革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方法论指导,对英国宗教改革发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改革的历程、清教运动,以及改革对英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影响都加以论述,力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加以展现。

### 8. 期刊论文 [穆海博 人性与宗教的冲突——解读格雷厄姆·格林的宗教四部曲](#)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20(5)

格雷厄姆·格林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布莱顿硬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被称为宗教四部曲,都涉及到了天主教和天主教徒。在这几部宗教小说中,作家以独特的创作题材为我们剖析了人性与宗教之间的种种冲突,描述了一个由多种信仰、特征和经历的人们所组成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及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危机。解读格林的宗教四部曲,可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对人类精神生存的关怀。

### 9. 学位论文 [许璐斌 16-17世纪的远东保教权之争](#) 2009

在16-17世纪的远东殖民史、天主教传教史中,保教权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罗马教廷为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国内史学界对于远东天主教史的研究多以某一地区的教会发展史或某一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为主,对欧洲诸殖民国家间的远东保教权之争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种不足,本文详细探讨了16—17世纪远东保教权的内涵、特征以及西方殖民国家对其展开争夺的历史过程,对远东保教权由葡萄牙一国独有到它同西班牙、法国、教廷四方共有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描述,并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从15世纪初到1534年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确立过程。作者从教皇授予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着手,论述了远东保教权的葡萄牙化,并概括了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第二部分分析了保教权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实际作用。作者通过对远东葡系传教士参与的各种世俗活动的分析,诸如对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提供商业信息、参与殖民地管理、投身商业活动等世俗活动的分析,探讨了远东保教权的世俗功效,认为远东保教权巩固和发展了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第三部分论述了西班牙对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挑战。该部分分析了西班牙侵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原因,详细论述了西班牙教会势力进入远东的经

过，并认为双方的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世纪20-70年代，该阶段以两国世俗政府间的直接对抗为主，其特点是国家为传教修会服务；第二阶段是16世纪70年代后，以两国各自支持的传教修会间的较量为主，其特点是修会为各自的保护国谋利。

本文的第四部探讨了17世纪教廷争夺远东教务领导权。该部分从分析16世纪中后期以来远东保教权对发展远东教务的阻碍入手，总结了教廷介入远东宗教权力冲突的原因，论述了教廷自1622年起为收回远东教务领导权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第五部分讨论了17世纪后期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在远东的活动及其影响。该部分论述了法国教会势力东扩的原因及法国政府为此所做的各自努力，认为法系耶稣会士依靠科学知识服务于远东各王室从而扩展了法国在远东的政治、宗教势力，并指出法国教会势力的东来加剧了各方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激烈程度。

第六部分全面探讨了17世纪远东教区的各种权力之争。该部分紧紧围绕17世纪国家与教廷、修会与教廷、国家与国家、修会与修会间在远东的各种权利之争和矛盾冲突，着重突出斗争的激烈程度，凸显了远东保教权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这场争夺对远东教会的历史影响。

综观16—17世纪西方各殖民国家对远东保教权之争，其对天主教远东教务的影响可谓利弊多。教皇授予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国家远东保教权是希望能借助它们的经济、军事力量发展远东地区的教务，实现天主教的海外兴盛。尽管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对远东教务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们始终把世俗利益放在首位。诸殖民国家争夺远东保教权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各自的世俗利益，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导致了教会利益经常与殖民国家的世俗利益发生矛盾，而结局往往是教会利益被殖民国家忽视。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不仅受殖民国支持的各传教修会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为独占某一地区的教务而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甚至当时在远东的欧洲传教士已经开始视其世俗使命高于其肩负的宗教使命，各自的国家利益高于教会利益。殖民国家和传教修会的这种民族主义排他性做法严重损害了远东教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而17世纪教廷介入远东保教权之争不仅没有平息远东教区内的种种矛盾，实现对远东教务的统一管理，而且还扩大、加深了各方的权力之争。远东教区在经历了16世纪后期的短暂辉煌后，逐渐走向了混乱、衰落。

## 10. 期刊论文 [施雪琴. Shi Xueqin 宗教民族主义与文化解殖——近代菲律宾反教会运动浅析 - 东南亚研究](#)

2007, "" (1)

反教会运动是近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菲律宾宗教民族主义诉求的目标是推翻西班牙教会的专制统治，争取菲律宾民族的宗教自由与平等权力。菲律宾反教会运动不仅推翻了西班牙天主教会，而且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并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菲律宾独立教会，对推动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本土化、多元化以及文化解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lgdzkxxxb200402028.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lgdzkxxxb20040202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242c16b-aeb6-4405-9b0a-9e4d0081daa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